

NOBEL

LITERARY PRIZE WINNERS' SERIES

1950



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

主编 / 刘硕良

哲学·数学· 文学

〔英国〕伯特兰·罗素
(1950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蓝仁哲等译

LITERARY PRIZE WINNERS' SERIES

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

主编/刘硕良

哲学•数学•文学

〔英国〕伯特兰·罗素
(1950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漓江出版社

(桂)新登字03号

· 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 ·

哲学·数学·文学

[英]伯纳德·罗素

蓝仁哲等 译

*

漓江出版社 出版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159—1号)

邮政编码: 541002

上海新华书店发行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9.5 插页6 字数455,000

1992年6月第1版 1992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6200册

ISBN 7-5407-0900-1/I·639

定价: 平 装10.95元

彩盒精装16.45元

新时期有数的宏伟工程

——《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序

刘硕良

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作品的译介，不自今日始。早在二三十年代，一些获奖作家的作品就介绍到中国来了。我们久已熟知的文学名著，如《约翰·克利斯朵夫》、《静静的顿河》、《布登勃洛克一家》等等，都是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的代表作。不过，以往这些译介都没有特别着眼于获诺贝尔文学奖这一角度，甚或有意无意地回避了它，而且所介绍的数量有限，大部分获奖作家还不为中国读者所知晓。

适应改革开放大潮推出的这套壮观的《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不同以往的零散译介。它以系统介绍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作品为己任，凡是这个头号国际文学大奖的得主，都要尽量为之单独选出1卷，体裁不限，长短不拘；每卷均有译序和授奖词、答词、生平年表、著作目录，力求给读者提供一个能真实地反映诺贝尔文学奖及其每一得主的风貌的较好版本。不仅过去译过的获奖作家的若干名著要适当选入本丛书，更要深入地介绍许多尚无译文、尚未在中国展露其庐山真面目的获奖作家的代表作。即使过去已有译介的作品，收入本丛书后，译文作了更新或校订，并增加了前言、附录，其译介的深度和精确度也已超越于旧译。

为什么要如此兴师动众，有计划有系统地出版这么一套大

型的《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呢？当1982年丛书头4种问世时，就有人表示过怀疑。随着社会改革开放的深入，随着丛书各卷的陆续推出，随着人们视野的逐步开阔，在经历过从简单否定到一味推崇两个极端之后，对诺贝尔文学奖持客观的有分析的科学态度的人是越来越多了，这套丛书的价值和作用也已为文学界、新闻出版界和越来越多的读者所确认了。但人们的认识的发展总是不平衡的。直至今现在，仍然有人不很理解：“诺贝尔文学奖不是资产阶级的吗？不是带有地域和政治偏见的吗？为什么我们要以它为标准来划线呢？……”为了更清楚地说明丛书的出版意图，回答关心它的同志的疑问，趁丛书加快出版进度、力争两三年出齐90卷，并采用统一的封面设计，各卷逐步纳入新的外形框架的机会，增写了这篇总序，谈谈这套丛书的缘起和设想，以进一步和广大读者沟通，并就教于各地方家。

*

*

*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不久，1978年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在长沙召开，首次确定了地方出版社“立足本省、面向全国”的方针，涉足外国文学领域的出版社很快由两三家增加到几十家。1980年冬才挂牌的漓江出版社面对并起的群雄，面对人民文学、上海译文两家最具权威的老牌出版社，感到要在众山夹峙的缝隙中走出一条生路来，非另辟蹊径不可。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推出了以《保尔和薇吉妮》、《白夜》、《巴黎的忧郁》开头的小开本“外国文学名著”系列，也正是基于要自成特色、要开拓新领域、要出一批名著而又少复以至不重复“人文”、“译文”足印的考虑，当郑克鲁和金子信两位先生1981年联合建议推出诺贝尔文学奖丛书时，我们很快就接受了。

不错，文学不同于自然科学，文学奖的颁发往往会和一定阶级的意识形态相联系。诺贝尔文学奖既生发于资本主义社会，就不可避免地带有那个社会的意识形态包括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的烙印。意识形态的不同，价值观念的不同，常常导致人们对文艺作品及其评奖工作的认识上的歧异。大家看到，一年一度的诺贝尔奖的评选，物理奖、化学奖、医学奖的得主，一般都众望所归，极少异议，而文学奖就比较麻烦，不时会引

起这样那样的诘责和批评。是不是一有非议就证明评委们评错了呢？恐怕还不能这么看。文学作品的特性本来就容易使它人言言殊，不像自然科学成果那样有比较统一的、公认的、可以量化的鉴评标准，加之诺贝尔文学奖本身虽以张扬“理想主义”相要求，实际衡量和掌握时却有很大的选择空间，外人无从得知其内幕详情——即使是评委也不得透露近50年的有关档案，所以，在批评意见和评奖理由之间有时很难径情直遂地作出谁是谁非的判断。但抛开这些因素不论，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工作主观上存在某种局限，有时囿于视野或偏见，以致较次要的作家获奖，更显要得多的作家却名落孙山的情况，是确实有过的。

以地域来说。诺贝尔文学奖从1901年开始颁发，到1991年止，中间有7年因战争未授奖，有4年每年授予2位作家，实际得奖作家共有88位（萨特未领奖）。他们分布在5大洲30个国家，而主要集中于欧美，其中法国12人，美国9人，英国8人，瑞典7人，德国6人，意大利5人，西班牙5人，俄苏4人，挪威、丹麦、波兰各3人，爱尔兰、瑞士、智利、希腊各2人，比利时、南斯拉夫、捷克、冰岛、芬兰、以色列、尼日利亚、埃及、南非、印度、日本、危地马拉、哥伦比亚、墨西哥、澳大利亚等15国各1人。尽管评委会近几年第一次颁奖给非洲和阿拉伯世界的优秀作家，受到舆论的广泛好评，人们仍然觉得还有一些地区和国家的杰出作家理应更早更多地进入获奖行列。就拿亚洲来说，获奖作家迄今仅有2位，而北欧却有12位，悬殊如此之大，无论就各该地区的文学状况或就其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来说，都未必与实际相副。造成这种悬殊显然不单纯是亚洲文学翻译介绍少所能解释得通的。

以作家来说。一方面，托尔斯泰、博尔赫斯这样一些文学大师未能获奖，总使人不免有遗珠之感（受损害的决不会是这些大师本人），特别是拿他们和某些获奖作家的实际成就与历史作用相比较，更让人难以理解评奖的天平究竟是怎样倾斜的。另一方面，某些对社会主义持反对态度的作家，包括社会主义国家的流亡作家得奖，除了他们文学上的业绩外，明眼人都不难看出其中政治因素所起的作用，不然为什么不授给那些文学成就显然更高而思想比较进步或者比较持中的著名作家呢。

凡此种种，都是诺贝尔文学奖的缺陷和不足。其实，任何文

学奖的颁发都有一定的政治倾向和侧重角度，都受一定的价值观念和取向的制约，不可能十全十美、皆大欢喜。我们无意苛求诺贝尔文学奖，要它绝对公正，完美无缺；指出诺贝尔文学奖的局限，只是要如实地对它加以评价，不盲目地把它看得至高无上，不唯“诺贝尔”马首是瞻，不患“诺贝尔情结”。对任何文学现象和文学作品，包括诺贝尔文学奖及其获奖作家作品在内，我们都应该有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的独立的评判。盲目崇拜是最没有出息的。

明乎此，我们还要出版诺贝尔文学奖丛书，我想至少有三层考虑：

一、诺贝尔文学奖毕竟奖励了一大批卓有成就的杰出作家，他们的优异产品已成为世界文学宝库和人类共同财富的一部分，值得我们认真地研究和借鉴。许多举世公认的名家，如罗曼·罗兰、法朗士、莫里亚克、纪德、萨特、加缪、奥尼尔、福克纳、海明威、吉卜林、肖伯纳、叶芝、艾略特、贝凯特、托马斯·曼、黑塞、伯尔、肖洛霍夫、皮兰德娄、显克维奇、阿斯图里亚斯、聂鲁达、马尔克斯、帕斯、塞拉、拉格洛夫、汉姆生、泰戈尔、川端康成、索因卡、马哈福兹、戈迪默……荣膺了诺贝尔文学奖桂冠，使这项大奖当之无愧地拥有不凡的品位和隆盛的声誉。有些获奖者在世界范围内影响不算很大，但在其所在国或所在地区仍然占居重要的位置。至于有些作家获奖时呼声甚高，过后则影响减退，这在某种意义上应该说是正常的。中外文学史上都有一些作家如彗星划过天空，不能把光亮久留人间，但这并不排斥他们的价值有朝一日又可能重新得到人们的发现和承认。文学现象纷繁多变，我们很难简单地从获奖者一时声名的盛衰来断定其当年获奖是否允当。

二、诺贝尔文学奖毕竟是本世纪以来国际上最重要、最持久、最有影响的文学现象之一，它对各国各民族众多作家的吸引力是有目共睹的。这一点，即使从它有时授奖欠公而引起种种议论也能得证明——证明它为世人为文坛所普遍关注。对于这样一项大奖，这样一种幅射面宽广、渗透力深远的国际文学现象，世界各国都颇为重视，我们中国作为文学大国，理应对它有可能如实的客观的了解，理应在占有丰富资料的基础上对它进行科学的审视和独到的评析，如果我们不系统出版其作品，又

有什么根据对它发出这样那样的指责和议论呢!

三、出版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不等于不加分析地全盘肯定这个大奖和所有获奖者及其作品。如前所述,获奖的不见得完全处于同一水平线上,未获奖的并不因此而贬损其价值。我们组编诺贝尔文学奖丛书,无非是在新时期改革开放潮流的促动下,从新的角度多开一扇窗口,对北京、上海已出的外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和20世纪外国文学丛书起一点补充配合的作用,丝毫没有以诺贝尔文学奖为标准来对外国文学作品划线的意思,当然也就谈不上以它来识鉴和取舍所有外国文学作品了。即从漓江出版社来说,我们在出版《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的同时,还推出了一系列其他外国文学名著和《法国20世纪文学丛书》、《域外诗丛》等众多的外国文学作品,诺贝尔文学奖只是其中一部分而已。

尽管如此,作为新时期我国翻译界出版界一项有数的宏伟工程,《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仍以它新颖的角度、诱人的色彩,受到了广大文学工作者和文学爱好者的欢迎和关注,得到了社会多方面的支持和鼓励。全国“八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包括了这套丛书。在新闻出版署主办的首届(1980—1990)全国优秀外国文学图书评奖中,这套丛书有3种——福克纳卷《我弥留之际》、莫里亚克卷《爱的荒漠》、阿斯图里亚斯卷《玉米人》同获一等奖,占一等奖图书总数19种的15%。许多作家赞扬和购藏这套丛书,一次邮寄数十元、上百元到书店、出版社成批购买的不在少数。历届全国书市和在香港主办的中国书展,都把这套书作为重点陈列的展品。新华社多次用中外文向国内外播发丛书出版消息。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工人日报、中国青年报、解放日报、文汇报、《读书》、《世界文学》、《中国翻译》等大报刊以及中央电视台、国际广播电台等新闻媒体,多次介绍这套丛书。唐骏、李文俊、彭燕郊等知名作家都撰写过评论。丛书的影响甚至越过了国界,一些国外人士将这套丛书的发行,视为中国坚持对外开放、重视洋为中用、对诺贝尔文学奖持郑重态度的一个标志。瑞典诺贝尔图书馆收藏了丛书精装本,文学奖两位评委会见过丛书主编,谢尔·埃斯普马克教授并专程访问了漓江出版社,瑞典驻华大使馆和瑞典有关机构还在提供版本等方面给予了友好的帮助。丛书的出版无疑有利于文化交流,也有利于瑞

典皇家学院更多地了解中国的文学。

*

*

*

出版大型丛书，通常会有一个庞大的编委会，而编委会真正起作用的未必很多。《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的出版，不仅在书的内容和形式上有所开拓，在书稿组织上也希望做点新的尝试：不重名而责实，一切以质量为依据，以实效为依据。

首先确定总的构想和框架：在研究的基础上翻译，翻译与研究相结合，力求使每一卷成为了解该作家的优良选本并起一定的向导作用。这个总目标主要是通过四个方面的工作来实现的——

一、篇目：由于诺贝尔文学奖绝大多数是表彰某一作家的整体创作而不特指其某部作品，译本选目必须从授奖词中提名赞扬的作品和史家公认的作品中挑选，首先侧重其代表性和影响力，保证选目的权威，同时适当顾及篇幅、可读、整体平衡和少与其他译本重复等因素。

二、译文：尽量从原语种较好的版本直接移译，即使是译者寥寥可数的小语种作品仍绝大部分译自第一原著。由于组稿困难，个别需要转译的，或采用原著者自己翻译或认可的译本，或设法以原书进行参校，力求忠于原文，接近原文。译作以新译为主，少数旧译在收入丛书时作了必要的校订。希望较多地保持丛书的新鲜感，并传留一部分已有定评的佳译。

三、前言：务期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作家作品进行科学的分析和评论。强调占有丰富的第一手资料，融入国外最新的研究成果。只要言之有物，决不吝惜篇幅。福克纳卷的译序就长达4万余言，等于一本出色的福克纳导读或研究福克纳的入门小册子。

四、附录：尽量收齐授奖词、答词、重要访谈录和生平年表等有关配件，给读者提供较多的信息，提供据以作出自己评判的原始材料。这部分文字名为附录，实乃凤尾，读者对它的兴趣决不在正文之下，而且不可不读。

我们设想通过这些安排，在各卷有限的篇幅内扩充容量，提高质量，并共同形成特色，树立整体优势，不独使我国首次译介

的作家作品引人注目,即使我国介绍过的作家作品也能显示出新的翻译水平和出版水平,让购置了其他版本的读者仍然会对诺贝尔丛书中的新版本发生兴趣。

总的框架和构想确定后,最重要的工作就是遴选和延请对获奖作家研究有素并能胜任译撰工作的专家来主持各卷译事:提出选目,组织翻译,撰写前言,辑录附件。这些工作有的由主持者一以贯之,有的则由他组织同道合力进行而最后总其成。实践证明,各卷主事人选准了,工作做到家了,整个丛书的质量就有了最基本的保证。

值得庆幸的是:诺贝尔文学奖的名气和知识分子赤诚的事业心使我们顺利地得到了语种齐全、实力强大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以及北京、上海、南京、杭州、重庆、广州等地许多专家的大力支持,先后共襄此一盛举的老中青优秀翻译工作者多达200余人。像董衡巽、冯亦代、赵少伟、吴劳译海明威,李文俊、陶洁译福克纳,巫宁坤译斯坦贝克,施咸荣译贝凯特,柳鸣九译萨特,罗新璋译纪德,桂裕芳译莫里亚克,林秀清译西蒙,高年生译伯尔,刘习良译阿斯图里亚斯,吕同六译皮兰德娄,力冈译肖洛霍夫,高慧勤译川端康成,李野光译埃利蒂斯,林洪亮译显克维奇,绿原译米沃什,文美惠译吉卜林,杨武能译海泽,郑克鲁译杜伽尔,郭宏安译加缪,章国锋译豪普特曼,王逢振译赛珍珠,吴岳添译法朗士,倪培耕译泰戈尔,邵殿生译索因卡,袁小龍译艾略特,刘星灿译赛费尔特,申慧辉译肖伯纳,黄梅译高尔斯华绥,石琴娥译拉格洛夫,李之义译海顿斯坦姆,林桦译延森,朱炯强译怀特,宋兆霖译贝娄,荒芜、汪义群译奥尼尔,潘庆龄译路易斯……都可说是恰当其人,有些人选甚至是国内再好不过的人选。他们长期研究所译的作家,熟悉其全部作品和风格,了解外界有关的评论,自然最有条件选准篇目、把握译文,也最有条件写出高水平的前言来。

*

*

*

丛书起初是分辑出版的,每辑各书在年代、国家、体裁上稍加搭配并有框架统一的封面,但辑与辑之间年代交叉,封面各异,读者保存和查找感到有些不便。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特邀著

名装帧设计家陶雪华女士统一进行整套丛书的设计,各卷封面统一,书脊上标明获奖年份,便于读者按年代先后排放。平、精装本均有前后环衬、作家肖像和丛书总序、总目,精装本还增加了彩印函套。过去已出的各卷,重印时将统一调整,个别卷为两位作家合出的也将单独分开。预计到1993年,如果还有两位作家获奖,丛书就将恰好排满90卷,以后新增1位增出1卷,《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这项系统工程也就大功告成并能不断增加活力了。

与丛书配合印行的还有正在编辑的《诺贝尔文学奖词典》和诺贝尔文学奖评委回顾诺贝尔文学奖的权威著作以及分类选本等。相信丛书出到八九十卷以至上百卷并有各类相关产品相继问世时,一座座华美的文学殿堂将吸引更多的读者一道跨入充满希望的21世纪的壮丽征程。

衷心感谢译者、读者和社内外同仁的携手合作!

衷心欢迎来自各方面的批评指教!

1991年12月26日

瑞雪天子桂林

· 译本前言 ·

光耀文坛的哲学家数学家

蓝仁哲

（蓝仁哲译）

1949年，罗素获得了英国官方和学术界的最高荣誉：英王乔治五世授予他“功勋奖章”，英国科学院选他为荣誉院士。1950年底，瑞典皇家学院授予罗素诺贝尔文学奖，表彰他写了“捍卫人道主义理想和思想自由的多种多样、意义重大的作品”。于是，罗素不仅是本世纪英国最著名的人物之一，而且成了世界文化名人；甚至有人认为，自伏尔泰以来，西方文人中还不曾有谁享有过像他这样高的声誉，没有谁对同代和后世产生过像他这样大的影响。

正如艾兰·乌德^①在《罗素哲学：关于其发展之研究》^②的序言里首先声明的那样：“罗素的著述所涉及到的学科是那么多，大概现存的人没有一个能通晓所有这些学科，写一篇像样的评论……。凡论述罗素的人都应该说清楚所研究的范围，这样他个人的局限性才不致被误认是他所研究的那个题目的局限性。”因此，有必要说明，本文不是研究罗素的评论，而只是《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罗素卷》的编选序言，旨在对罗素

① 艾兰·乌德，罗素研究者和传记作家。

② 艾兰·乌德一部未完成的作品。见罗素《我的哲学的发展》篇末。

作为一位哲学家、散文家和社会活动家进行简明扼要的评介，以便本书读者更好地了解罗素，从本卷选编的作品中获得一定的启迪。

罗素与哲学的缘分，可以从他的散文《我为什么喜爱上了哲学》中窥知。罗素从11岁开始学习欧几里德几何学，从此铸成他一生对数学的爱好。但他考入剑桥大学三一学院之后，结交了一些哲学家，诸如怀德海、穆尔和麦克泰戈等人，在他们的影响下，他对新黑格尔主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893年他获得数学荣誉学位之后，便把学术努力转向了哲学。1897年他的第一部哲学著作《论几何学的基础》问世。接着，在1900年他又出版一本题为《莱布尼兹哲学述评》的作品。这两部著作代表了罗素前期的哲学思想。在这个时期，他从沉醉于黑格尔哲学到放弃新黑格尔主义的营垒，跟随穆尔一道转向了新实在论。同时，这两部著作还表明罗素早期受到康德哲学的强烈影响，尤其是《论几何学的基础》，他在该书坦率地承认，“把康德有名的论证加以某种限制和解释就可以得到”他的观点^①。他在晚期的哲学著作《人类的知识——其范围与限度》里，又表述过类似康德哲学的一些思想；但他认为，他自己主张的人类知识的综合先验性不像康德那样偏向于主观。因此，艾兰·乌德把罗素哲学的经历粗略地归纳为：从康德到康德。可是，罗素不同意这个说法。然而，无论是否属于康德哲学的体系，罗素哲学发展的前期与后期，有一点显然是共同的：他没有改变唯心主义的立场，只不过前期更带客观唯心主义的色彩，而后期更多主观唯心主义的论调。

① 见《论几何学的基础》，第179页。

罗素哲学思想的重大转折发生在1900年，从而使他带上数理哲学家的鲜明特色。这年7月，他出席在巴黎召开的国际哲学会议，结识了意大利数学家、逻辑学家皮亚诺^①。皮亚诺这时已形成自己的一套符号逻辑系统，罗素从其符号逻辑体系中发现了自己“多年来一直在寻找的那种用于逻辑分析的工具”^②。于是，罗素立即开始研究数理哲学，先用了两个月去熟悉和完善皮亚诺的符号法，年底便完成了《数学的原理》一书的初稿。该书以数学与逻辑等同为基本论点，1903年正式出版后成为一部该学科的划时代著作。为了支持这一论点并着手建立一套新的数理逻辑系统，罗素花了整整十年时间，与其大学期间的指导教授怀德海合作，完成了三大卷巨著《数学原理》。这部巨著力图把全部纯数学都用纯逻辑前提引导出来，从而使数学逻辑化，逻辑数学化。这不仅是罗素在数理哲学方面的最重要的成果，而且也是他对20世纪的科学所做出的最杰出的贡献。尽管罗素为这部巨著的出版倒赔了50英镑，它却为罗素赢得了世界性的声誉。

我们称罗素为数理哲学家，还因为他“走到哲学是通过数学的，或者说得更恰当一点，是通过一种愿望想找到一些理由来相信数学的真理”^③。罗素认为，一种有价值的哲学，应该建筑在一个宽大坚实的知识基础之上。对于罗素哲学来说，这个宽大坚实的知识基础便是他对数学和逻辑学的长期研究，以及由此而获得的重大成果。罗素整个的学术生涯致力于三种主要的研究——数学、宗教和科学，并从中寻求与个人无关的客观真理。罗素在自己的著作里常常重复他对“哲学家太懒、不

① 皮亚诺 (Giuseppe Peano, 1858—1932)，创立符号逻辑，著有《微分学与积分学原理》、《几何演算学》等。

② 见罗素《自传》第一卷144页。

③ 见罗素致艾兰·乌德的信。

研究数学或太笨、不懂得科学”的嘲笑，他认真地从数理逻辑的基础上建构自己的哲学体系，认为只有数理逻辑才是真正的逻辑。他把数理逻辑方法运用于哲学研究，从而形成了罗素哲学的另一大特色——分析哲学。罗素说过：“每一个真正的哲学问题都是一个分析的问题；而分析问题的最好方法是从结果开始，然后溯至前提。”^①事实上，罗素进行数理哲学的研究正是这样做的，比如，在《数学的原理》和《人类的知识》里，他都是从结果走向前提。他提出的逻辑原子主义，也是他运用这种分析方法的结果。他还认为，数理逻辑的分析方法即使不能给人以确定性，也丰富了知识；他甚至把分析哲学作为一种增加知识的方法竭力推广。所谓科学的哲学研究方法，即采取分析的形式或方法进行哲学思辨，达成哲学上的体认。因此，罗素不仅被视为分析哲学家，还被尊为分析哲学的奠基者。他首次把分析方法引入哲学研究领域，对本世纪英美的分析哲学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种方法的应用，对整个当代西方哲学也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

罗素是一位属于各派哲学的哲学家，这一方面意味着他涉及的哲学范畴宽广，另一方面也表明他的哲学思想几经变化的事实。的确，罗素在不同的时期提出过一些不同的主张，在他的先后著述里也存在自相矛盾的话，但他却始终坚持了一贯的目标和方法。他的目标就在于寻找和建立宗教真理、数学真理和科学真理，他的方法便是科学的数理逻辑分析方法。早在1918年，他在致康斯坦斯·麦理逊的信中就这样写道：“在死之前，我必须找到一种方法，能道出我之为我的本质所在，这种本质东西我迄今没有说过——它既不是爱也不是恨，既不是

① 见罗素《数理逻辑在哲学上的重要性》。

怜悯也不是蔑视，而是生命的真谛；这种东西生性猛烈，来自远方，把非人间的事物的广大和那可怕的无情力量带到了人生中来……”

了解罗素哲学的关键也许在于明了：哲学并不是罗素追求的目标，他的哲学思想只是他孜孜以求的具有确定性的知识的副产品。然而，正像罗素谈及康德时说的那样，“一个坦白的哲学家应该承认，他已经得到了最后的真理这种可能不太大”。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所有的哲学家都是失败者，罗素自己也不例外，他的追求终归失败。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罗素的哲学思想始终属于英国自洛克、柏克莱、休谟和穆勒以来的古典经验主义的传统；他的哲学研究固然取得了重大成就，但无论在本体论和认识论上，或在他提出的逻辑原子主义里，他都一直深陷在唯心主义的泥坑。一个唯心的经验主义哲学家，即使聪慧无比，苦苦追求客观真理，终难越过“主观主义”这道屏障；他总是从主观到客观，而不是相反，更不承认辩证唯物主义所提出的实践出真知的论断，更不接受实践是发现真理和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客观事实。

在本世纪的哲学家中间，既进行专门的哲学研究，又能从事高等教育，同时还不懈地积极参与社会政治活动，唯有罗素一人。罗素早年就对政治感兴趣，他于1896年出版的第一本著作《法国的社会民主制》，便是他在柏林研究政治学和经济学的结果。这期间，他认真研读过马克思的《资本论》，与法国工人运动领袖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等有过交往。即使在写作《数学原理》的繁忙工作期间，他也未中断对政治的兴趣。他与费边社的中坚分子，诸如肖伯纳、威尔斯、韦伯夫妇等人，都十分友善。本世纪初，他曾为自由贸易和妇女参政等积极活动，还曾

两次作为议员候选人。从第一次世界大战起，罗素的主要精力便从学术研究转向了社会政治活动。1914年到1917年底，他一直参与反战宣传，因撰写传单抗议对一个拒服兵役者判刑，曾被伦敦法庭判为有罪，罚款一百英镑；为此，还被剑桥大学三一学院解除了教职。1918年5月，他为反战的《论坛周报》撰写一篇文章，竟被以“诽谤盟友”的罪名判处监禁六个月。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发表了三部政论著作：《社会重建的原则》(1916)、《政治理想》(1917)和《自由之路》(1918)。

1920年春天，罗素访问了苏联，会见了列宁。虽然他认为“目前的这个政府适合于俄国”，但他不赞成暴力革命、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他持的基本态度是否定的。他的访问印象和观点集中反映在其后发表的作品《布尔什维克主义：理论与实践》(1920)。同年8月，罗素到了中国，应邀讲学一年，在北京大学演讲《心的分析》。有趣的是，罗素十分迷恋北京，对中国文化倍加赞赏，这与他的访苏印象形成鲜明的对比。罗素于1921年9月回到英国，此后十多年间，发表了不少著作，其中涉及政治问题、社会问题和伦理道德问题的作品，占了相当大的比重。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罗素到了美国，先后在几所大学任教。由于他所持的伦理道德立场和反对宗教的观点，1940年在受聘纽约市立学院教授之际，竟遭到一位主教的抗议，引起轩然大波。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罗素相继获得各种殊荣。五十年代，罗素几乎全神关注社会政治风云。他目睹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残酷，十分担心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尤其害怕使用原子武器，会对人类和世界造成毁灭性的破坏。他先在英国广播公司呼吁禁止使用核武器，1955年又发表了闻名的罗素——爱因斯坦声明，同时还征集各国著名科学家的签名，发表了一项支持